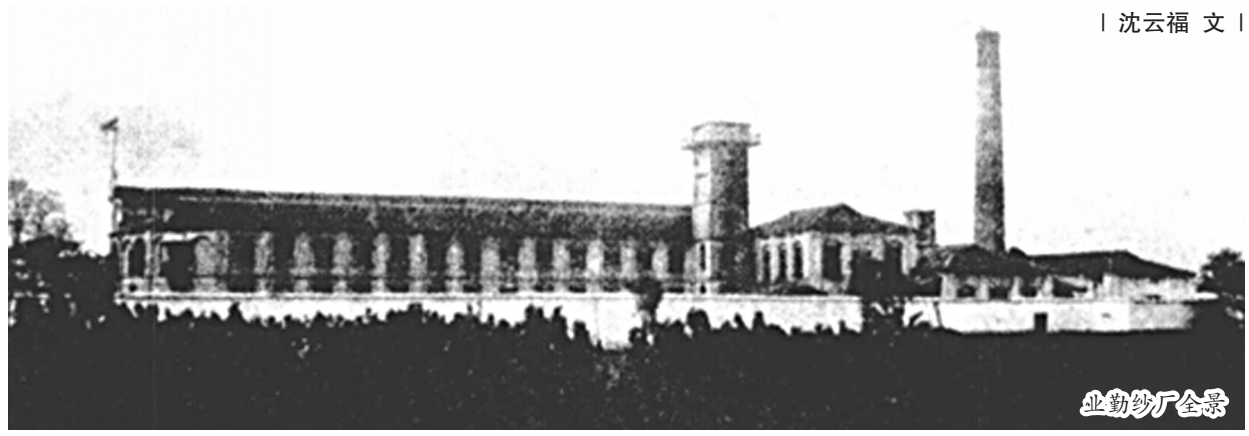
2026.11.17 星期二
责编 施剑平 | 美编 唐立群 | 校对 罗丹硕
江南晚报

业勤源：无锡近代工业的银色序曲

| 沈云福 文 |


业勤纱厂全景

百年工商名城无锡，历来以水兴城，以商旺市。大运河在无锡境内绵延数十公里。一百三十年前，一阵前所未有的机器轰鸣，就在运河岸边响起。由杨氏兄弟创办的业勤纱厂，开启了无锡近代机器大工业和百年锡商潮起的序章。它还以绅领商办模式先行运作，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起点。

如今漫步在槐古桥边的运河岸，“业勤源”石刻静静伫立，不远处便是当年业勤纱厂旧址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厂区遭日军炮火摧毁，厂房机器化为焦土。但这座一八九五年动工、次年投产的纱厂，“近代工业第一家”的历史地位不容磨灭。驻足碑前追思往事，杨宗濂、杨宗瀚兄弟的实业探索，以及由此生发的锡商故事，似悠悠流水浮现在眼前。

沪上受挫，雄心未泯 业勤纱厂的艰难诞生

业勤纱厂由杨氏兄弟创办。兄长杨宗濂，字艺芳，1832年生；弟弟杨宗瀚，字藕芳，1839年生，二人在家族五兄弟中分居老大、老三。他俩早年投身军旅，之后进入洋务体系，深度接触新式厂务。

1891年秋，李鸿章委派杨宗濂整顿积弊重重的上海机器织布局。杨宗濂因公务缠身无法赴沪，便举荐弟弟杨宗瀚主持局务。到任后，杨宗瀚个人先行垫资，又多方奔走筹措官款与商股，订立厂规、整顿人事，化解租界地方势力干扰，使织布局生产步入正轨，投产之后产销兴旺，盈利可观。

眼见局面向好，1893年李鸿章计划扩大纺织规模，向外订购新式设备、公开募股。不料同年10月，厂区清花车间突发大火，恰逢狂风肆虐，整座厂区被焚毁，百万两资产付之一炬。眼看着自己数载经营的事业化为灰烬，杨宗瀚“望火而号”，痛不欲生，“欲跃入火中者三次，均被人劝阻救回”。李鸿章震怒之下，撤了杨宗瀚的总办之职。杨宗瀚怏怏不乐，返回无锡故里。

官办实业的仕途之门就此关闭，民办企业的机遇之窗悄然开启。1894年11月，张之洞出任两江总督，电邀杨宗瀚赴南京商议政务。1895年，甲午战败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，外国取得在华设厂的特权，苏州、杭州、重庆、沙市被辟为通商口岸，洋纱洋货大肆涌入，挤压本土生计。对此，张之洞提出兴办本土制造业、抵制外来利权，便再度邀约杨宗瀚赴宁谋划。

经过在上海织布局的历练，杨宗瀚熟稔机器纺织的机器配置、原料采买、人事用工全流程，萌生自办纱厂的念头。他向张之洞提议在无锡设立机器纱厂，开民间机器工业风气，当即得到张之洞的赞许。

不久，杨宗瀚拟定集股章程：“窃自通商以来，洋货行销日广，洋药而外，以纱布为大宗……彼族之攘我利权，占我生理者，似亦莫甚于纺织、缫丝诸大端。”他认为通商开埠之后，纱布是除鸦片之外最大宗的进口商品。江南民间素来勤于纺织，无锡地处苏常交通要道，周边盛产棉花，招工条件便利，适合兴办纱厂，待取得成效再拓展缫丝产业。最终勘定东门外兴隆桥作为厂址，水陆交通便利，厂名定为“锡山业勤机器纺纱公厂”，简称业勤，取古训“业精于勤荒于嬉”之意。

先开风气，以阜财源 业勤甫出就身手不凡

杨氏兄弟办业勤一开始就立足“自应先开风气，以阜财源……”这一理念，得到了众多亲友的支持。两位常州表弟刘鹤笙、刘叔培是清代状元刘纶之后，最初规划杨氏兄弟各认股四万两，刘氏兄弟各认股二万两，再向外招募十二万两，合计股本二十四万两。其中十八万两用于购地、建厂、购置设备，余下六万两充当收购棉花的流动资金。

厂区占地约四十亩，厂门朝向古运河，意在汇聚财源。主体为西式砖木二层楼宇，设备全部进口自英国，拥有细纱机28台，纱锭10192枚，配套完整的清花、梳棉、粗纱、摇纱设备；动力方面配置三台兰开夏锅炉、两台350马力双缸蒸汽机，另配直流发电机，同时建有修理工场与轧棉工场。

募股过程却一波三折：刘氏兄弟股金未能缴足，外部商民又普遍观望，资金缺口巨大，洋商设备款项不断催逼。危急关头，杨宗瀚再赴南京，依靠旧日交谊，从江苏省库积谷公款借得十万两，另外吸收存款四万两，又变卖自家田产，甚至变卖妻女首饰，凑集二万两，靠着拼凑得来的十六万两，方才渡过资金难关。

1896年底，业勤纱厂正式开工生产，由杨宗瀚为总办，主持厂务。向无锡四乡招工1100人，以产14支纱为主，日夜出纱8000余磅，年产纱约7500件，商标为“四海升平”，大部销往苏南农村，供广大农民编织土布之用。该厂由于机器生产，质量、产量均高于土法生产，销路甚广乃至供不应求，因此获利颇丰。据《北华捷报》报道：“该厂虽然昼夜开工，对于常州府和苏州府的各个乡镇对该厂的需要，尚无法全部供应……这个纱厂的盛况是少有的，在富有效率的经营之下，该厂股息最少将为25%。”该厂开办后第二年即盈余4.8万两，第三年盈利又有增长。

在企业制度层面，业勤先行变革洋务运动盛行的官督商办模式。官督商办名义上提倡商办，实际由官方委派官员掌控大权，商股出钱却缺少经营话语权，极易滋生舞弊贪腐。业勤则为绅领商办，企业资本全部来自民间私人资本，官方款项属于借款性质，只收取利息，不参与分红，更不干预内部经营。杨氏兄弟虽拥有官僚身份，但主要用来对外交涉、争取资源。

几乎同一时期，张謇的大生纱厂也在南通加紧筹建。1899年3月23日，张謇专程到访业勤纱厂参观借鉴，得到杨宗瀚热情接待。张謇也认为“绅领商办”或“绅督商办”，与“官督商办”相比，有着明显的进步。

自1903年起，业勤在三年中连续增添纱锭，使全厂纱锭达到13832枚，产品也增加了12支和16支纱，男女工人增至1400人，全厂日夜产纱一万余磅，进入了最为昌盛之期。在连年获利的基础上，到1906年已盈利50余万两，高出原有资本一倍。除偿清了所借的积谷款和债务外，还给股东对本对利分红。

彼时，年轻的荣德生还在广生钱庄做事，常来业勤账房办理钱款往来，目睹了这家新式纱厂的兴旺，这也在他心底埋下投身实业的种子。

业勤效应，外溢北方 无锡好地方美誉远播

随着业勤纱厂的创办，一个影响近代中国经济的精英群体——锡商悄然形成，一个全新的工商时代来临。无锡先进的纺织技艺也向外输送，连同锡邑独有的人文与风物一道传向北方，自此美名远扬。

业勤历经鼎盛之后，受市场起伏、家族内部权责纠葛、设备老化等因素制约，在民国年间逐步走向式微，但它开启的实业范式已然推广。它的成功，打消了地方士绅对新式工厂的疑虑，此后茂新、振新、裕昌、庆丰、丽华、丽新等机器生产企业接连落地，业勤办厂经验，被锡商纷纷借鉴。

杨氏并未将实业局限于一地。杨宗濂早年督理北方纺织事务，侄子杨味云曾跟随杨宗濂参与山西绛州纱厂的筹建，协助杨宗瀚主持过业勤纱厂的厂务，他带着纺业积累入主天津华新后，整顿原有机构，仿照业勤纱厂组建有经理、协理、副理、总管、工务长以及事务长等层次的经营管理体制。津厂初建，堂弟杨翰西推迟自家广勤纱厂的筹建，派出得力人员，束装启程，赴津援助。杨味云任用无锡人殷廷良为工务长，引荐无锡人蒋自赓与华新订包工合同，从无锡、上海等地招收大批男女工人、机匠北上，日夜加班安装机器。

1918年6月，华新津厂正式开工生产。开工后，因工人不敷使用，当地又难觅熟练工，故工厂还多次派员到无锡续招，光1918年就在无锡“招得女工数百名”。一时间，在华新系统有大批职员和工人操着“无锡口音”。待津厂站稳脚跟，杨味云又陆续开辟青岛、唐山、卫辉分厂，有力推动华北纺织业的兴起。

著名剧作家曹禺年少时寓居天津，曾在《大公报》上读到无锡旅行社的广告：“请到无锡来，无锡是个好地方。”彼时天津华新汇聚大批无锡籍从业者，对吴地风光的这句宣传语深深镌刻在曹禺的记忆中，最终化作经典文学作品《雷雨》中的专属用语，让“无锡是个好地方”的美名流传至今。

百年回望，业勤纱厂是无锡乃至我国民族工商业银色基因的重要源头。正如《激荡岁月：锡商1895—1956》作者陆阳所说，它以敢创人先的探索，为近代民族工业奏响序曲提供范本。锡商先辈实业救国、开拓担当的精神，融入城市血脉，与无锡的红色基因交相辉映，让无锡这个好地方，既有山水之秀，更有精神底蕴与实业风骨。大运河边，日光铺洒，粼粼波涛之上跃动着点点银光。业勤源，不但引领近代民族工业之潮奔涌向前，而且在创业理念、技术和制度创新等方面，长久启迪着后人。


天津华新纺织厂

江南腔调工作室